

# 方實與《炎黃春秋》

## ——世紀之交的中國故事（下）

• 葉維麗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四節已於2019年6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五至九節。

我把《炎黃春秋》（以下簡稱《炎黃》）的存在視作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中國的一個「現象」。有人將它與二十世紀初的《新青年》媲美，是否有可比性可以商榷。今後，也許會有史家對「《炎黃春秋》現象」感興趣，遠距離對它加以評審。作為一名「近觀者」，在這一部分我繼續講《炎黃》的故事。

說到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的改革開放，「80年代」、「思想解放」已經成為別具含義的關鍵詞，它們往往和「傷痕文學」、「走向未來」叢書一類的出版物相連<sup>①</sup>，「弄潮兒」是一批中青年才俊。1990年代初「鄧南巡」之後席捲而來的「商品經濟」大潮，將人們的精力引向突飛猛進的物質發展，以至有人哀歎「人文精神」的

「失落」。恰恰在這樣一個大講金錢物質、「精神」遭遇「危機」的年代，《炎黃春秋》出現了，稍後堪稱其「兄弟刊物」的《百年潮》也來了。這類雜誌呼應的，是此刻在中國社會湧動的、對近現代國史「求實」的強烈訴求，看似不動聲色，實則是「於無聲處聽驚雷」。談到《炎黃》時，杜導正這樣對我說，「你爸爸和我，都不是一個人。它〔指《炎黃》〕是時代的產物，你不搞別人也會搞，總會有人搞」<sup>②</sup>。這不是杜導正故作謙遜，是他充分認識到時代背景的重要性。

比起同類刊物，《炎黃》「活得」最為長久，成為「象徵」和「旗幟」。在本文上篇我們講了雜誌的「緣起」以及「錢」與「人」，在這一篇我們探討「《炎黃》現象」的其他一些方面。

\* 本文初稿寫於父親方實去世不久後的2016年夏，此後《炎黃春秋》發生的巨大變故沒有改變我的基本思路，定稿在初稿基礎上修改完成。2006年以來的十餘年間我曾陸續對多人進行採訪，在此我願對接受採訪的各方人士表達誠摯的謝意。

## 五 「宗旨」的形成：「讀者」與「學者」的作用

我看到一個說法，說《炎黃》在辦刊之初就有一個「宗旨」，它由蕭克將軍「確定」；又說，創刊以來，《炎黃》「大致遵循的是蕭克、張愛萍、費孝通、杜潤生、李銳和杜導正等人所確立的辦刊宗旨」<sup>③</sup>。我想，這麼講也許是「打保護傘」，用心良苦，但它在多大程度上為實情？這裏我想提出三個問題：第一，《炎黃》在辦刊之初就有明確的「宗旨」嗎？第二，《炎黃》辦刊「宗旨」的形成過程是怎樣的？第三，在這個過程中，哪些因素和社會力量發揮了作用？

在上篇我已經部分地回答了第一個問題，簡單說，答案是否定的。《炎黃》的「宗旨」並非由某個人所定，無論他或他們的身份地位聲望如何。這份雜誌的「宗旨」或曰「品牌特色」並非與生俱來，而是有一個形成的過程。如上篇第三節所述，《炎黃》確定以「紀實」為辦刊原則是1995年的事，並在此後數年中反覆強調此原則<sup>④</sup>。



2004年第1期《炎黃春秋》刊出全體工作人員合影。(圖片由葉維麗提供)

2004年新年伊始，編輯部在回應讀者的關心時鄭重寫道：「本刊的宗旨，簡單說來，就是實事求是地寫歷史，老老實實地講真話……『朝聞道，夕死可矣。』實事求是，求真求道，這不僅是我們辦刊的宗旨，也是我們做人的宗旨」<sup>⑤</sup>，並登出一幀題為「《炎黃春秋》雜誌社全體同仁向讀者恭賀新年」的照片。話聽來有些悲壯，雜誌社工作人員「集體亮相」也是頭一遭。事實是，此刻《炎黃》正面臨着能否繼續存在的危機。在這一艱難時刻，編輯部選擇直接面對社會，訴諸讀者，重申「宗旨」，可謂意味深長。我注意到，自1995年以來，編輯部幾乎每年都會在「新年敬告讀者」一類文字中作一番自我界定：我們這個雜誌是幹甚麼的；到了2004年，《炎黃》不但已經對自己的定位充分自覺，並且準備為之付出代價：「朝聞道，夕死可矣」，它表明心迹的對象，是讀者。

我還注意到，編輯部在那些年的新年致辭中並沒提過雜誌的「宗旨」是誰給定的，連「宗旨」一詞也不常用。如果我沒有弄錯，《炎黃》「宗旨」由某人所定這一說法最早出現於2011年，即雜誌社創刊二十周年之際<sup>⑥</sup>，二十五周年時又再次出現。依我看，如果說《炎黃》在辦刊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宗旨」，那麼它的形成不但有一個過程，而且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語境下，社會諸方「合力」推動的結果，同時也是與某些勢力博弈的結果，而並非由某個人所「確定」。我不想貶低蕭克這樣的「大佬」在《炎黃》創刊早期所起的作用，蕭克曾明確表示願做雜誌社的「後台」，並在若干關鍵時刻對《炎黃》予以堅定支持。在中共老一代革命者中，蕭老對寫歷史要真實的態度甚為鮮明，

他說，「歷史事實是最大的權威」；在為1996年出版的《長征大事典》所寫的序中，他對紅軍早期歷史上的造假現象予以不留情面的抨擊<sup>⑦</sup>。《炎黃》的理念與蕭克對待歷史的態度頗為契合，雜誌社早期有蕭克這樣一位功勳卓著、鐵骨錚錚的老將軍「撐腰」實為幸運，但是把他說成《炎黃》「宗旨」的「確定」者、把雜誌社工作人員說成蕭克的「麾下」，則有些過頭了，這麼說反映出的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維和等級觀念。杜導正雖然是晉察冀出身，但他過去並不認識蕭克，因為辦《炎黃》才與他逐漸熟識，「有過幾次深談」。善於與上層領導聯絡溝通是杜的強項，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下，甚至是有必要的，尤其是為了一項值得付出的事業，但由此說老邁的蕭克「指導」着《炎黃》的工作，則誇大其詞了。2006年杜導正對我說，對《炎黃》的事，「蕭克也沒有過問很多」，這是實在話。

蕭克非常欣賞東漢王充的一句話：「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並在雜誌社創刊五周年之時（1996年夏）將它作為題詞贈與《炎黃》，這在後來被人視作蕭克為《炎黃》立下的「宗旨」。在1990年代的時代背景和政治局境下，主張認真反思歷史、「求實存真」的是一批有良知的中國人，《炎黃》吸引了來自社會四面八方的股股清流，蕭克的支持和保護固然重要，有時甚至十分關鍵，但更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和歷史潮流。總之，是中國社會上下內外（黨內黨外）合力養育守護了這份雜誌，我們不能眼睛只朝上看。在這一節，我想說說「《炎黃》敘事」裏常被忽略的兩個群體：讀者和學者。

先從引起我注意的王景山先生說起，我把他看作讀者的代表。1994年

王景山給《炎黃》編輯部寫了一封長信，以〈我喜歡《炎黃春秋》〉為題發表在該年雜誌第八期上，下面引幾段：

「我把『炎黃』想像為中華民族的象徵，把『春秋』理解為悠久歷史的指代，……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原本就是汗水、血水、淚水的交織。」

「『君子有三鑒：鑒乎古，鑒乎人，鑒乎鏡』……我以為治史……要有『史膽』、『史識』，所謂『史膽』，就是敢於發掘歷史真相，敢於直面歷史事實，敢於秉筆直書，敢講真話，不做瞞和騙的蠢事；所謂『史識』就是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既十分注意主流和九個指頭，也不忽視支流和一個指頭，在左轉右彎的迷霧中尋找歷史人物的來龍去脈，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從而求得真實，求得真理。」

「我國過去的正史，常常多所隱瞞，魯迅稱之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炎黃春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這種禁忌，甚至對革命領袖和革命進程中的某些重大失誤，也提供了一些過去因種種原因而鮮為人知的內情和背景材料，因而使人耳目一新。……〔《炎黃》〕作者群包括了（以文章刊出先後為序）李銳、師哲、溫濟澤、凌雲、蕭克、李之璉、莫文驊、李德生、伍修權等，他們曾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層動態和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或知情者，不管是他們自己的回憶錄還是別人寫的訪問記，應該說都提供了寶貴的無可替代的第一手材料。」<sup>⑧</sup>

王景山的信從一個讀者的角度，對創刊三年多來《炎黃》的「辦刊宗旨」和「風格特色」做出精到的總結，受到社長杜導正的高度讚賞，杜曾在一些場合對王景山的「史膽史識」說加以運用發揮。前面提及，1995年初《炎黃》確定了以「紀實」為特徵的

辦刊風格，為表鄭重，該年第一期以「本刊編輯部」名義發表了一篇類似「告示」的文字，題目為〈尊重史實是本刊辦刊的原則〉，裏面有這樣一段話：「本刊一貫強調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敘述，要求實存真，『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力求發表的每一篇文章都情之殷殷，言之鑿鑿。」<sup>⑩</sup>該文執筆為王景山，是杜導正通過宋文茂請他寫的<sup>⑪</sup>，王充的名言作為「辦刊原則」被堂正地引用。

王景山的例子告訴我們，《炎黃》的風格特點在創刊後不久即露端倪，此後逐步清晰明朗，經歷了一個編者、作者和讀者之間「互動」的「有機」過程。王景山是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魯迅研究專家，1957年的「右派」。由於同事宋文茂的關係，他從1991年《炎黃》創刊之初即為讀者，「一見鍾情」<sup>⑫</sup>，逐漸地把自己當成了《炎黃》的自家人，於是便有了上引他的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代「本刊編輯部」執筆。

王景山於西南聯合大學肄業、1940年代後期北京大學畢業。在一篇文章中，他回憶了一首當年在西南聯大學生中廣為傳唱的歌子，名叫《茶館小調》，它針對昆明茶館裏隨處可見的「莫談國事」提示牌，調侃嘲弄國民黨政府壓制言論的做法，這首歌令王景山終生難忘<sup>⑬</sup>。青年時代的王景山是文藝積極份子，他的「底子」是在1940年代大後方學生抗議活動中打下的，和共產黨老幹部不是一個路子，但是到了1990年代，在要談國事、以史為鑒上，他和他們走到了一起。在早期《炎黃》讀者中，王景山敏銳地看出這份雜誌獨特而寶貴的價值，從中國史學傳統的高度幫助《炎黃》闡釋說明自己。之後他曾

多次出席雜誌社組織的活動，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擔任過幾年特邀編委，在名人雲集的編委會成員中，他也許是最不出名的。今天，鮮有人知在《炎黃》尚默默無聞、艱辛圖存時，一個名叫王景山的人獨具慧眼，站出來為這份雜誌高聲叫好，並做出頗顯識見的點評。

說到《炎黃》讀者成份時往往有種傾向，即強調中高層幹部和知識份子所佔比例。我沒有統計數字，僅根據有限的接觸和耳聞，加上翻閱歷年雜誌上的讀者來信，得出的印象是，《炎黃》讀者涵蓋的社會層面頗為寬泛，既有離休老幹部、部隊老將軍、高級知識份子，也有鄉鎮基層幹部、縣教育局退休人員和老知青；既有沿海大城市的，也有偏遠省份的；年齡以中老年為主，生活並非都寬裕，如陝西省某縣一位讀者無力一次付清半年訂費，只能按月寄款；1996年雜誌從每期3.2元漲到4.8元時，有位讀者難以負擔，其他讀者伸出援手代為訂購。

在當年林林總總的報刊中，《炎黃》與讀者的關係頗為特殊，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開始是相見恨晚，繼而海誓山盟，終至難捨難分」<sup>⑭</sup>。一本雜誌常常被數人傳閱，不少人從借閱成為訂戶，如我一位朋友的哥哥，他中專畢業，退休以前是普通技術人員。他在妹妹處看到《炎黃》後就成為「忠實讀者」，曾說「《炎黃春秋》是我的摯愛」；他去世後，女兒繼續訂閱。我另一位朋友的母親是離休的中央機關幹部，她和周圍一些老幹部組成一個「《炎黃春秋》閱讀小組」。北大哲學系張岱年教授在1996年雜誌社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發言說：「我每月都收到很多種雜誌，不能全讀，唯《炎黃春秋》我每期必讀。」<sup>⑮</sup>重慶某縣有位讀者身患絕症，病情略有好轉

後寫信給《炎黃》編輯部，說他「仍在人間」，「還想繼續讀《炎黃春秋》幾個月」<sup>⑮</sup>。杜導正告訴我，多年來讀者以來訪、來電和來信方式表達支持，他讀信時「常常落淚」。來訪的讀者中有位「耄耋之年的老者」，在家人攙扶下前來「娓娓傾談」。有甚麼能比讀者的支持更讓編輯部同仁感到欣慰？

讀者來信不斷肯定《炎黃》的「史膽」和「史識」，有一位直白地寫道：「這個雜誌講實話」<sup>⑯</sup>；另一位希望看到更多的親歷者文章：「趁當時親歷和參與了這些事件的老同志還健在，把這些事件的真相如實地寫出來，傳之於世，汲取教訓。」<sup>⑰</sup>除了有肯定和誇讚，也不斷有讀者給《炎黃》提建議、挑毛病、找錯別字，不把自己當外人。1994年一位北京讀者來信指出，《炎黃》個性還不夠突出和鮮明，在封面和版式設計上，「與時下許多刊物差不多」<sup>⑱</sup>——這可能指那一時期封面上的明星美女照。

一位讀者的話讓我幾乎落淚：「過去我們中國人知道自己中國的事太少了。」<sup>⑲</sup>是時候了，到了1990年代，很多中國人都想「知道自己中國的事」了。1992年第八期上一位讀者來信說，「正確對待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陰暗面、錯誤和缺點……說出來好……現在不說，將來總有人說，自己不說，別人總會說。共產黨人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豈能對自己的錯誤都不敢『解放』」<sup>⑳</sup>。《炎黃》成立十五周年時，一位讀者寫道：《炎黃》所做之事，「也是一種啟蒙，就是揭開歷史上的種種迷彩服，使人們知道許多事情的真相」<sup>㉑</sup>。《炎黃》的優勢在於把想知道歷史事實的普通人和尚健在並願意據實寫出來的「親歷者」連結在一起，呼應了存在於中國社會

各階層的普遍要求。讀者像是「啦啦隊」，在雜誌社一路磕絆走來的過程中不離不棄，為它打氣加油；他們的反饋和肯定幫助編輯部明確和堅定了雜誌的「宗旨」和自己的使命。

1996年成立五周年時，《炎黃》從銷售額到經營管理等方面均已漸入佳境。創刊後不久即擔任特邀編委的李普此時坦承：「當初我不是積極的支持者」：一是因為雜誌社沒錢，二是因為沒有上級機關向下派訂、「你叫它訂多少份，說一不二」，而「只能靠市場上的上帝」——即讀者；李普說，「上帝之所以為上帝，是他們要先看貨色，才肯慷慨解囊」，《炎黃》就是靠「上帝們自掏腰包」<sup>㉒</sup>。1996年的抽樣調查表明，《炎黃》的個人訂戶佔90%以上，他們為雜誌撐開了一片天地，是《炎黃春秋》的「衣食父母」。

說了讀者，我想再簡單提一下學者。學者（主要指治中國近現代史和黨史）對《炎黃》認可和支持的價值和意義不可低估，他們把本人學術研究成果與對公眾歷史知識的普及結合起來，從學術角度為《炎黃》增添了分量，是雜誌社重量級作者隊伍的一部分。自1995年以來，從楊奎松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幾乎所有知名學者都在雜誌上發表過文章：楊天石、唐寶林、劉志琴、陳鐵健、耿雲志、雷頤、劉小萌……名單還可以開下去，恕我就此打住。此外，中央黨校韓鋼、王海光，南京大學高華等學者也都給《炎黃》寫稿；隨着雜誌在海外的影響力日增，美籍華裔學者張光直、何炳棣和薛君度也在《炎黃》上發表過文章。

曾擔任社科院近史所所長的陳鐵健200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它不僅披露了寶貴的史料，也

對治史方法和治史者品格做了一番議論。在向讀者介紹了楊奎松等人對「西安事變」的研究後，陳鐵健寫道：「正是這些著作，擺脫了過去長期沿用的從事物結局或既定結論出發去推導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複雜多變發展進程，而輕視或無視對曲折變幻過程的具體考察的簡單思想方法」，還說，「歷史真相不能指望一次說完；不斷挖掘歷史資料，不斷評判修正歷史，是歷史學不斷走向科學的必然之路……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其治史水準的高下，無不與其史才、史識、史德密切相關，而史德即良知賴以存在的基石是至關重要的」。他在提到一個「為尊者諱」的例子（「西安事變」發生後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出席者的表現）後，寫了這一段話：「對於這件史事，可以有三種處理方法：一是合盤寫出，隨人評說；二是全部隱而不宣，任人揣摩；三是寫一部分、隱一部分，寫所當寫，隱所當隱，即如只寫張國燾如何過激，隱去毛、秦諸公的過激。不諱惡者諱賢者尊者，此之謂乎？我想，即使不是歷史家，只是普通讀者，也會對上述三法，作出正確判斷而加以取捨。」<sup>②③</sup>

我對陳鐵健先生在這篇文章中表現出的史才、史識、史德深感欽佩（也願就歷史學是否為「科學」進行商榷），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寫不出這樣具學理性的文字，用心的讀者能夠從中琢磨出歷史學科的一些基本道理，由此及彼，在「不疑處」生疑、發問。

總之，《炎黃》的生存、發展和逐漸確立自己的「品牌特色」，離不開讀者的鼎力支持和高水平專業學者的「加盟」。由於篇幅所限，另外一個重要群體——「公共知識份子」，就從略了。

## 六 「有些話，我們不說誰說？」

翻閱頭十四年的《炎黃》令我目不暇接，特別是1995年確定「紀實」原則後，幾乎可以把這份雜誌視為收集歷史信息、尤其是近現代中國歷史信息的寶庫。2000年開始擔任顧問的杜潤生看到了這一點，在2002年雜誌社新春座談會上稱《炎黃》是「現代版《資治通鑑》」，認為如果假以時日，十年、二十年後它可以成為「歷史信息庫」，並說，「在座的都是歷史見證人」，「年暮老人都是知情人」，雜誌社要幫助他們「把知道的信息留下來」，「教育後人，警示後人」，「有些東西不便發表，可以存在知識庫裏。若干年後會對中國歷史學的貢獻很多」<sup>②④</sup>。

希望《炎黃》成為資料保存場所的不是一個人。早在1995年就有讀者來信告之：「有位長期在中央部門工作的老同志，……有很多活資料，需要整理發表」，希望雜誌社能夠出力相助<sup>②⑤</sup>。1999年夏溫濟澤去世，走得有些突然，留下大量材料，特邀編委于光遠在給我父親方實的電話中有感而發：「如某人不幸去世，編輯部可與其家屬商定代為保存，並找到適當的人對這些故紙堆進行整理。」採納于光遠的建議，《炎黃》於2000年初開闢了「故紙堆」欄目，第一篇文章就是于光遠寫的，並附一張「故紙」照<sup>②⑥</sup>。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炎黃》，比如看它在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發聲」——這並不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事，李銳早就有話說；1998年初任仲夷就提出「為民作主還是由民作主」的問題，歐遠方也是此中重要人物<sup>②⑦</sup>；到了2002年雜誌社搬到月壇小樓時，編輯部向外界約稿已明言，除「紀實性」文章以外，「極少量

評論性文章均可發表」，並在2003年〈新年寄語〉中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議題<sup>28</sup>。回顧歷史本來就不是為了就事論事，「鑒今」是《炎黃春秋》的應有之義。此外，我們也可以對1994年以來雜誌社在胡耀邦問題上的作為加以梳理，這方面也有很多材料，包括邀請戴煌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我們甚至可以看到《炎黃》對現實社會問題的介入，如發表李昌平關於「三農」問題的文章，等等<sup>29</sup>。

十四年間可圈可點之事太多，在我看，最具《炎黃》特色的，還是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真相」的揭示與反思。自創刊以來，《炎黃》就以登載歷史親歷者講述引人矚目，發表了大量文字。這方面的作者有寫〈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的知名人士黃宗英，也有寫〈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的普通百姓<sup>30</sup>，但是，在此類文章中，通常最受讀者關注的還是一批中共中高層老幹部的文字。在這一節，我主要講講他們的情況和情懷，重點人物是溫濟澤和李莊，重點群體是中共黨內「『一二·九』/『三八式』」那一代人。

《炎黃》上發表的第一篇有分量的親歷者文章，是1992年第一期溫濟澤的〈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這是他在終於完成了李維漢囑託後為公眾寫出的「報告」。文中提到，垂危之際的李維漢拉着溫濟澤的手斷斷續續地說：「……要對他〔王實味〕……負責，……對他的……家屬……子女負責。」溫濟澤寫道，「李老臨終前的囑託，我是深刻銘記在心的」。王實味案開啟了延安「審幹」的序幕，對此後幾十年中國政治生態的影響極為深遠。溫濟澤的文章對1940年代王實味冤案的形及文革後歷經周折的平反過程做了詳細和具「現場感」

的描述，如提到王實味被誣為「托派」後對同事溫濟澤的哭訴<sup>31</sup>。當年批王實味時，溫濟澤寫的〈鬥爭日記〉曾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晚年溫濟澤排除重重阻力為王實味翻案，或許除去為完成李維漢的囑託，也有自我反省糾錯之意<sup>32</sup>。

自稱「末代延安人」的李慎之於胡繩去世後在《炎黃》上發感慨：「古今中外，有幾個人到了七十、八十還能反思，還能『盡棄所學而學焉』呢？西方哲學家認為，未經過反思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人生。……胡繩的反思只能由我們這些人和更年輕的人繼續下去、深入下去了。是唯後死者之責，何敢辭！」<sup>33</sup>

溫濟澤曾經說過一句話，令人回味：「我們經歷過的事情太多了。有些話，我們不說誰說？還是要說啊！」<sup>34</sup>做事得有領頭人，中外皆如此，或許在中國尤甚。我想起1984年初在紐約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當美國記者問到訪的中國總理為甚麼要穿西裝（而不是「中山裝」）時，他這樣回答：「我們穿了，老百姓就敢穿了。」我當場聽到，心想這位中國總理很誠實。進入1990年代後的中國，站在最前沿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是一批老共產黨人。這些體制內原中高層官員利用「官家」邏輯給予他們的「身份」、「等級」和「地位」優勢，率先講出本人親歷的、曾被遮蓋扭曲的歷史「真相」，有他們頂着壓力打頭陣，平民百姓紛紛跟進，這就是中國特色。

回到溫濟澤。當別人尚在觀望，或不甚關心，或還沒聽說這份雜誌時，溫老就把《炎黃》視作「我們的」，在最初的十來名特邀編委中，名至實歸的恐怕只有他一人。這或許與《炎黃》和《中華英烈》的淵源有關，但也並不盡然。溫濟澤有話要說，他意識

到有一個說話平台的重要性。父親方實在溫濟澤去世後的悼文中寫道，溫老是《炎黃》的「第一個高產作者」，在雜誌出版的頭八年，他一共發表了十六篇「高水平，有獨到見解的」文章，發表第一篇文章時他已經七十八歲<sup>⑤</sup>。除了寫文章，溫老還為《炎黃》出謀劃策、分憂解難，編輯部人員沒少在他家開會商量事情。杜導正對我說，最初幾年《炎黃》的「核心成員」裏，除了他和我父親，還有蕭克、溫濟澤、廖蓋隆和李莊。我父親回憶，溫濟澤「非常熱心地支持辦好這個刊物，經常提示辦好這個刊物的編輯方針，幫我們組稿、約稿」，他身患腦血栓、腿腳不便後，仍堅持參加編輯部的例會，坐着輪椅讓人推着來<sup>⑥</sup>。

1998年溫濟澤八十五歲時，在《炎黃》發表了最後一篇文章，題為〈告別20世紀〉。文中說，他「參加革命奮鬥」整整七十年，在「國民黨統治下」被捕三次、坐牢五年，「在我們中國共產黨內」挨整三次，加上他得過的三場大病，「我一生經歷不少於81難」，他說，像唐僧西天取經一樣，他這一輩子下來，「也算是取得一部真經」<sup>⑦</sup>。

溫濟澤這樣總結他的「真經」：「迎接未來世界的機遇和挑戰，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往直前，堅持創新，勇於創新。……人的思想解放是無止境的！科學發展是無止境的！世界發展也是無止境的！」<sup>⑧</sup>這是一位垂垂老者的最後呼號，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溫濟澤以高亢的語調結束他生命的「告別文」，但是，像李維漢一樣，他心底也埋着「憂」。《炎黃》特邀編委曾彥修先生寫道，在溫老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會坐着輪椅參加一些座談會（可以確定是《炎黃》的會），「每次發言，都以身示範，講他親身參與立三路線、王

明路線『左』傾盲動的盲目性……即使他的體力已有所不濟，也還像天鵝之死前舞蹈一樣。……他多次在有一批老共產黨員參加的座談會上，談及必須汲取『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危害的教訓問題」<sup>⑨</sup>。

溫濟澤這樣描述自己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副職任上被打成右派後的感受：「從此墜入萬丈深淵。……呼天不應，入地無門，簡直像在地獄裏、苦海中，自強不息地煎熬了20年。」1978年平反時，他已經六十四歲，「像火山爆發似地一心撲在工作上，要『找回20年失去的時光』」<sup>⑩</sup>——這或許可以解釋為甚麼溫濟澤在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本職工作外，還做了那麼多額外的事。

《炎黃》創刊一年後左右，溫濟澤致信編輯部，其中提到：「『左』是根深蒂固的」，「我們今後不妨適當多登些挖『左』的根子的文章。但一定要實事求是」——請注意，這裏是「我們」而不是「你們」，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對「實事求是」的強調，這與「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的精神是一致的。溫濟澤還建議，《炎黃》可以適當登些關於革命英烈的文章，並說剛創刊時有，但最近「越來越少了」<sup>⑪</sup>。在中共英烈中，溫濟澤對瞿秋白情有獨鍾，為恢復瞿秋白名譽不遺餘力，並親自主持編纂十四卷本《瞿秋白文集》。少年溫濟澤是讀了瞿秋白著作後投身中共革命的，他的精神資源來自瞿秋白那樣的中共黨人。

在認識他的老人中溫濟澤享有崇高聲望。他去世後，李銳、于光遠、曾彥修、廖蓋隆和李慎之等人都寫了充滿感情的悼念文字。李慎之稱溫濟澤為「老派共產黨員」；曾彥修則說，溫老為「我從內心裏極其敬佩的一位革命前輩」，「中國先進知識份子中（不

分黨內外)的一位非常優秀的典型，是一個大寫的真正的人」，並說，溫老雖然沒有很高的職務，「按習慣，這不過是千千萬萬中層幹部之一罷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普通之至。這樣的人能代表黨嗎？我說，恰恰是這樣的人代表了黨的光明面」，正是這樣「埋頭苦幹、不計榮利、不計生死、終生苦鬥」，「半塵不染」的共產黨員，「才是黨的威信的來源」④。

1999年6月，《炎黃》特邀編委名單裏溫濟澤名字上出現黑框，此後，一位又一位「炎黃老人」去世，一個又一個黑框出現。2006年黑框出現在李莊的名字上。李莊是杜導正提到的另一位早期《炎黃》的「核心成員」，李莊家也是當年《炎黃》編輯部人員商量事情的地方。像溫濟澤一樣，李莊也是從一開始就把《炎黃》當成「我們的」，他對我說：我與《炎黃》「息息相通」。因為常登「敏感」、「犯忌」文章，《炎黃》不時被「上面」要求做檢討，李莊成了為雜誌社寫檢討的「專業戶」。這位原《人民日報》總編輯從1950年代起就沒少寫檢討，話該怎麼說，尺度該怎麼把握，了然在胸。上篇裏提到吳思的話，說一份雜誌要能活下來還得「不犯規」。要《炎黃》「不犯規」不容易，它能夠多次有驚無險地活了下來，多虧有像李莊這樣「體制內」的人知道「犯了規」後如何補救，如何拿捏說話的分寸，杜導正和方實當然也經驗豐富。

不但幫忙寫檢討，李莊也很早就為《炎黃》寫文章。晚年李莊出過一本書，名為《難得清醒》，對他自1940年初以來參加的思想改造和若干政治運動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和坦誠的反思。這本書的一些篇章擇要發表在《炎黃》上，其中一篇的內容是這樣的：在政治運動中，李莊一旦發現「自己想的

如果跟毛主席講的不一樣……思想上若有懷疑，必須立刻停止……人之愚昧，以至於此！……遊行時曾見一中年人赤膊狂舞。我呆呆看着，忽生一種淒愴的思想，……我不是同他一樣麼？」⑤

「淒愴」呀！

李莊寫道，「共產黨員不能只『唯上』、『唯書』，要『唯實』。解放思想不易，『唯實』似乎更難，兩者都做到了，才能說進入化境。這是大事之最，我畢生奮鬥的目標」⑥。人們也許記得，鄭板橋「難得糊塗」四字在1990年代的中國頗受歡迎，不少人家高掛在客廳牆上。老共產黨員李莊反其道而行之：真正「難得」的，是「清醒」。

李莊還寫道，「文革中受衝擊最大的是參加革命較早的老幹部，從某種意義上說，受益最大的也是老幹部」。文革中「受衝擊最大的」是不是老幹部可以商榷，但李莊這句話的落腳點在「受益」。何以「受益」？蓋因此而「清醒」。李莊表達了與溫濟澤「我們不說誰說」相似的意思：「反思」之業，「我們這代人做些好」⑦。

並非所有「受衝擊」的老幹部都「受益」了。《炎黃》逐漸成為「受了益」的老幹部的集合地，他們做顧問，做編委，做作者，但大多數人是做讀者。李銳很早就是作者，1991年《炎黃》第一期上就有他的文章，內容很正統，但李銳的名字很敏感，如何署名費斟酌。李銳給我父親打電話，說如用筆名就叫「怒吼」。蕭克聞訊後表態：發，就用本名，誰有意見，讓他給我打電話。歷年來李銳登在《炎黃》的文章中，發政治議論的不少。

李銳於2000年成為《炎黃》特邀編委，這一時期特邀編委名單中還有于光遠、李莊、李普、吳象、歐遠方、凌雲、曾彥修和廖蓋隆等人。原中央

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等人曾於1982年夏就西路軍問題對徐向前元帥進行採訪，1993年初《炎黃》上發表了那次訪談記錄，首次在公開出版物上披露徐向前對西路軍問題的真實看法<sup>④</sup>。2001年，廖蓋隆名字上出現黑框。

任仲夷一度在《炎黃》顧問名單中，到2005年底，他的名字上加了黑框。次年1月，《炎黃》顧問名單中齊刷刷出現了杜潤生、于光遠、李銳和李昌四人。熟悉1989年「六四風波」前後中國政情的人應該清楚這幾位當時的情況，他們在《炎黃》聚齊了。也許並非偶然，四人青年時代都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

李銳在2008年寫了一篇文章，他以李昌為例，談論中共黨內「『一二·九』那代人」。文章說，因為「反感國民黨政權獨裁和對日妥協」使他們「靠近並最終加入共產黨」，並說比起中共建黨時期那代人和後來因「打土豪分田地」進來的「大批農民和城鎮貧民」，受到「自由、民主、平等」理念影響的「『一二·九』那代人」更具理想主義色彩和獨立人格，與「黨文化」有抵牾，也因此成為1940年代延安「搶救運動」的主要對象<sup>⑤</sup>。這是李銳對同代人的自況，就像「老三屆人」寫自己，寫歸寫，後人會去評說，但自己要寫。因為對「『一二·九』/『三八式』」那代人感興趣，我把李銳的看法放在這裏。

從2003年開始，何方的名字出現在特邀編委名單裏，他是個「三八式」，抗戰爆發後進入中共，李莊、廖蓋隆、凌雲、曾彥修、李普等人都是「三八式」。在《炎黃》社委會裏，方實是「一二·九」，杜導正是「三八式」。應該說，從創刊之初到進入新世紀頭幾年，《炎黃》的「核心成

員」——借用杜導正說法——是由中共黨內「『一二·九』/『三八式』」為主的一批人組成的（蕭克和溫濟澤的「資格」更老），我父親任事的十四年見證了這一現象的逐漸明朗直至達到「高點」，此後隨着一位位老人的病衰或去世，世代交替現象開始加速，這從後來《炎黃》社委會和特邀編委的組成變化中可以看出。

2000年新年伊始，《炎黃》編輯部以〈志存高遠站在時代前列〉為題致辭迎接二十一世紀<sup>⑥</sup>，于光遠、李銳、李莊、李普、曾彥修和蘇雙碧寫文章表達對《炎黃》的期望與祝願，除了蘇雙碧之外，其他幾位都是「『一二·九』/『三八式』」。于光遠先生的話講得尤其好，他說：對待歷史的基本原則是「崇尚真實、崇尚獨立」，還說，「我祝願《炎黃春秋》一如既往崇尚真實，任憑風吹雨打，雷鳴電閃，我自巋然不動」<sup>⑦</sup>。溫濟澤以一生所取得的「真經」告別二十世紀，于光遠以「崇尚真實、崇尚獨立」之精神迎接二十一世紀。

溫濟澤的生命告別文以三個驚歎號結束：「思想解放是無止境的！科學發展是無止境的！世界發展也是無止境的！」它表達的是一種開放的、「世界的」視野，與黨外人士周有光先生「從世界看中國」異曲同工。曾彥修先生也有類似表述：「中國現在是世界的中國了，以後必須也永遠是世界的中國。愛國主義永遠是首先需要的，但也……不走偏狹的愛國主義之道。」<sup>⑧</sup>須知，這些老共產黨員青年時代都是「熱血」愛國者，他們在晚年力求超越「偏狹的愛國主義」，尤為難能可貴，耄耋以至期頤之年仍為「無止境的」「思想解放」鼓與呼，作「天鵝之死前舞蹈」，直至那一個個黑框罩將過來。

## 七 「鐵肩擔道義 妙手編文章」

圍繞着《炎黃》形成了一個曾彥修先生口中「老共產黨員們」的「朋友圈」，他們不時聚會，拄着拐杖、坐着輪椅也要來。李莊說：「別的活動可以不參加，《炎黃春秋》的我一定參加。」老人們以《炎黃》為「基地」「呼朋喚友」。2000年何方首次在《炎黃》上發表文章，此後成為重要作者，何方很可能是由他的好友曾彥修先生「引來」的，這應是《炎黃》作者群不斷擴大的一種方式。

這些「老同志們」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換信息、互相支持、抱團取暖——他們何嘗不需要抱團取暖？于光遠2000年初祝願《炎黃》「任憑風吹雨打，雷鳴電閃」，背後有多少沒說出來的話？杜導正告訴我，在《炎黃》頭十多年裏，雜誌社的處境是：「動不動就整你……我跟你爸爸幾次準備散夥了，……很苦的呀。」2003至2004年左右，《炎黃》面臨一次「生存危機」：原來的「主管單位」不願再管，如果找不到新的單位做「主管」，雜誌就不能再辦下去。我記得在那段時間的越洋電話裏，父親很焦慮，總說為《炎黃》「找婆家」的事——為雜誌尋找「主管單位」。在「動不動就整你」的處境之下，來自「老同志們」的支持對於《炎黃》格外重要，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它的生存所恃。

依我看，「老同志們」又大致可以分作「豎」、「橫」二條線：如果說蕭克、張愛萍和一些「國級人物」代表了自上而下的「豎線」（歷年給《炎黃》題過詞的包括楊尚昆、薄一波、費孝通、習仲勳、李德生、胡啟立等人），那麼「橫線」呢？借用劉家駒的話，就是「延安的那條線，有溫濟澤、

凌雲、李銳、曾彥修」，劉說，「這些老人形成一堵牆，對官僚體制很起作用，因為我們國家是官本位」。

「豎線」的主要作用是「當後台」，「橫線」上的人與《炎黃》關係更為密切和日常，他們不是有事時出來撐腰或在紀念日時題詞，而是把《炎黃》當親生孩子一般養，為其出謀劃策、排憂解難。前面已經提到溫濟澤、李莊，這裏再介紹一位我格外敬重的人物：曾彥修先生。1990年代中我第一次聽父親提到曾彥修，說起他在人民出版社社長任上把自己打成「右派」時，父親的眼圈紅了。像溫濟澤和李莊一樣，曾彥修為《炎黃》殫精竭慮，不斷去想「有哪些文章可做」。我看到他寫給我父親的一封信，建議《炎黃》系統地介紹「富庶但分配相對公平」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我相信這只是曾老寫給《炎黃》編者諸多信件中的一封，我沒看到的，其他「橫線」上老人為《炎黃》操心謀劃的事，不知又有幾何？

「一豎一橫」兩條線為《炎黃》編織了一個可觀的「網絡」，是雜誌社極為寶貴的「潛資源」。有朋友將《炎黃》視為在有「政治特權」的老人保護下的「政治特區」。這麼講有它的道理，不過我要說，「網絡」並非天然存在，「政治特區」更不會有人拱手相送，它們的形成是靠雜誌上發表的一篇篇文章來證明自己、吸引同道的，是靠「炎黃人」的信念、誠意、智慧和韌性一點點「開鑿」出來的。

如果說杜導正在「豎線」的開發和維繫上功不可沒，方實則對「橫線」的形成和發展貢獻良多。父親有一個黑皮電話本，已經快被翻爛了，那是他的「聯絡圖」，本文中提到的很多人名都在上面。父親在《炎黃》任事的十幾年間，家中電話不斷，我

每每感慨一個七老八十的人何以如此不得閒，而過去印象裏父親並不喜愛人際交往。父親的「優勢」在於，1940年代他在延安，「進城」後又長期在北京工作，認識的人不少。幾位《炎黃》工作人員也有同樣的觀察，劉家駒說，延安那條線，「是你爸的資源」；徐孔也說，「你父親聯繫了一大批老同志，他們的交情很深，他組織的一些稿件，我們就組織不了」；楊繼繩則說，你父親是雜誌社的「組稿員、推銷員和聯絡員，他聯絡了一批高層重量級人物」。

2005年夏末父親突然中風倒下後，一位《炎黃》朋友對我說，「老頭平時不聲不響，沒想到他牽了那麼多的〔線〕頭兒」，說話時，那位朋友淚在眼眶。我清理父親又厚又沉的公文包和他留下的其他材料，發現裏面確實有很多「頭兒」，其中一些材料應被視作《炎黃》歷史的寶貴資料。

「橫線」上不少人在年齡和經歷上與父親相似。前面說到，在頭十幾年裏，《炎黃》的中堅是「『一二·九』/『三八式』」那代人，其中李莊、廖蓋隆、曾彥修、凌雲、李銳、李普和李慎之都是我父親多年的老友或同事。這裏提一下原國家安全部部長凌雲，應該說，他的身份為《炎黃》提供了一把無形的保護傘。凌雲是我父母自年輕時代起的摯友，他1993年即為《炎黃》寫文章，可以肯定約稿人是我父親。

說到《炎黃》的稿源，雜誌社特邀編委、歷史學家張豈之在2001年曾說過一段近似批評的話：「《炎黃春秋》有多少專、兼職編輯，我不清楚。但我有個印象，好像沒有多少編輯下去組織稿件，只是幾位社領導向老朋友們、老戰友們約稿和組稿。這恐怕不夠，面也許狹窄了些。」<sup>⑥</sup>

杜衛東說，《炎黃》創辦之初，杜導正和我父親常在開會時打開皮包，拿出他們約來的稿件。到2001年張豈之發表看法時，《炎黃》已經存在十年了。我不清楚《炎黃》是否有「下去組稿的專、兼職編輯」，也不清楚歷年來給雜誌投稿和由編輯約稿的文章各佔多少比例。《炎黃》稿源中應有不少為自由投稿，尤其在後期；我父親任事的那些年、特別在《炎黃》的頭些年裏，由編輯部人員向熟人朋友約稿所佔的比重也許不小。稿源是一點點開發出來的，作者群是一步步建立和培育的，為此付出努力的不是少數幾個人，這裏講一講方實作為「組稿員」的點滴故事。

先說我目睹的。1994年夏，父親到美國探親，住在我波士頓的家裏。當地有位他1930年代南開中學的同學，妻子是趙元任先生的女兒趙如蘭。此時《炎黃》在海外不為人知。父親兩次與同學夫婦見面，每次都向趙如蘭約稿，請她寫趙元任。第一次她不置可否，第二次我從她臉上看出不耐，父親似無察覺，仍然「一根筋」地動員，我在一旁很不自在。我沒看到的、令人尷尬的場面也許不止一次吧。

父親約稿「內舉不避親」。我為《炎黃》寫過兩篇，我兩位伯父葉篤義和葉篤莊都寫過，五伯葉篤莊寫過至少五六篇，第一篇講「一代遺傳學宗師李景均」1950年代初去國緣故，最後一篇是關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生物化學家陸欽範的故事，它成為五伯生前最後一篇文字<sup>⑦</sup>。葉篤莊是農史學家，因政治冤案多年身陷囹圄，在獄中經批准得以繼續翻譯達爾文(Charles Darwin)著作，是《達爾文進化論全集》的主要譯者<sup>⑧</sup>。他的文章以一位老知識份子身份反思歷

史，與老共產黨員的角度有所不同。2006年春，大氣物理學家、我的七伯葉篤正由我陪同造訪李銳，兩位年輕時代走了不同道路的同齡世紀老人進行了一場坦誠的對話。我七伯是《炎黃》的「骨灰級粉絲」，每期必讀。我幾位伯父都與《炎黃》結緣，也算是一段佳話。

回到作為「組稿員」的方實。多年前我在家裏見過《潘漢年傳》作者尹騏，父親病倒後，我登門拜訪，得知我父親是通過天津南開中學老同學、曾任群眾出版社社長的李文達認識尹騏的。1982年，潘漢年得以平反，李文達建議公安大學圖書館館長尹騏寫潘。尹騏看了大量潘漢年密檔，並採訪了一系列有關人士，《潘漢年傳》於1991年在政法系統內部發行。1992年的一天，尹騏在李文達家中見到我父親，那時尹未聽說過《炎黃》，父親向他約稿。此後，僅就潘漢年及相關事與人，如關露，尹騏就給《炎黃》寫過八篇文章，「成為《炎黃春秋》十年作者」。尹騏告訴我，與潘漢年有關的大部分稿件是我父親編審的。尹騏對我父親的印象是，他「思想比較穩健，不說激情四溢的過頭話」；商討稿件時，「主要是聽取意見，沒有套話、官話，沒有權威意識，但是有原則性，說話是討論式的，說理」。

天津南開中學校友網絡是父親發掘稿源的一個線索。父親1930年代的校友、南開大學化學教授申泮文給《炎黃》寫過數篇關於張伯苓先生和民國時期南開中學教育的文章，為長期被埋沒的張伯苓正名，也為當年極富特色的南開中學教育做宣傳<sup>④</sup>。申先生厚厚的稿件裝在牛皮紙信封裏直接寄往我們家。往我家郵寄稿子的不止一人，往往因為沉甸甸的大牛皮紙信封引起我的注意。

在父親的電話本上我看到一個不熟悉的名字：趙淮青。父親去世後，我貿然給他打電話。趙叔叔非常熱情，他告訴我，他是新華社的幹部，也是《炎黃》作者，是父親邀他寫稿的，第一篇的題目是〈「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這篇發表在《炎黃》2000年第二期的文章寫到，有人認為，在同樣遭受屈辱的情況下，「中國作家比外國作家自殺的少」，趙淮青無法苟同，他將文革中不堪受辱的中國作家和藝術家的名字一一列出，那是觸目驚心的一長串名單，並將他們自殺時的情形照實寫出，其中有詩人聞捷。聞捷1950年代曾在新華總社工作，他的大女兒橘子和我同歲。趙淮青寫道，「他〔聞捷〕先把通往孩子房間的門窗縫隙用紙糊牢，然後打開煤氣，……死時才48歲」<sup>⑤</sup>。

父親專門為此文寫了「編者按」——《炎黃》為文章配「編者按」的極少——它這樣開頭：「下面發表的這篇文章，可能會引起一部分讀者的不同意見：『文革』這場災難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你們為甚麼抓住文革的錯誤不放！?……這不大符合黨中央一再強調的社會穩定是壓倒一切的精神」；這樣結束：「令人痛心的『文革』或改頭換面的『文革』今後絕不可以在我國再出現了。這是我們為甚麼要鄭重地發表這篇令人驚心動魄的文章的原因。」<sup>⑥</sup>

趙淮青陸續為《炎黃》寫了七八篇文章，包括寫原山東大學校長華崗和「胡風份子」呂焚<sup>⑦</sup>。他告訴我，除了向他約稿，我父親還向新華社其他一些老記者、老編輯約稿，「為打開新華社寫稿人隊伍做了很多工作」。不但做「組稿員」，父親還為《炎黃》做「推銷員」，每期雜誌面世，他都請杜導正用車一捆捆地拉到新華社

老幹部局辦公室代銷，足有一百幾十本，多年如此，一直到他病倒，新華社幹部中不少《炎黃》訂戶就是這麼來的。

這裏提一下《炎黃》與新華社的關係，我不知其詳，只講略知道的一二。1990年代中期後的一段時間裏，新華社曾為《炎黃》提供過一些幫助，據我所知，是非正式、非官方「人情」式的。我參加過幾次《炎黃》活動，會場在可以容納百人的新華社辦公樓一層會議廳；新華社一些資深編輯，如國內部的方煌和林耀，曾長期為《炎黃》編稿；此外，新華社出版的一份面向全國發行的報紙為《炎黃》做了若干年免費廣告。凡此種種，與長期在新華總社工作的方實的人脈和「面子」是有關係的。

再講一件也與新華社有關的事。李炳泉先生文革前是新華社外事部主任，中共建政前夕他作為地下黨員為北平和平解放立了大功。文革中，當年的功勞成為罪名，他被迫害致死。2003年4月李慎之先生去世，父親得知李慎之臨終遺作是紀念李炳泉的，要來在《炎黃》上發表<sup>⑤</sup>。登出後沒幾天，父親接到一位自稱「李炳泉專案組成員」的電話，父親對此事有如下記述：那位女士說，「李慎之文嚴重失實」，並說「我們專案組對待李炳泉是很寬厚的，很客氣的……我們要求你們在雜誌上道歉更正」。父親寫道，此後雜誌社進行了調查，「得到了更多的材料，證實李慎之文符合事實，對女士要求不予置理」。過了些日子，那位女士又給父親打來電話，這一次「更加氣勢洶洶」，聲言「我將把你們雜誌社告到法院！」

在這種情況下，雜誌社拿出兩件憑證：李炳泉死時的照片，以及當年

新華社軍管部門根據專案組材料對李做出的措辭嚴厲的結論。同時父親和李炳泉夫人通氣，李夫人表示，「李慎之文章內容翔實，切中要害，《炎黃春秋》無可更正。文革中李炳泉專案人員罪責難逃，家屬隨時準備與其法庭相見！」

我和李炳泉兒子從小就認識，看過那些慘不忍睹的照片。《炎黃》把當年的惡行公之於眾，令某些人大為光火。父親接到來自原專案組方面的電話不止兩次，打來電話的也不止一個人，態度都很惡劣。父親如此回敬：「到現在你們沒有一點愧疚、反省、認錯之意，反而要把正確、真實反映這一冤案的李慎之文章說成是『嚴重失實』，要求雜誌社『道歉更正』，否則要把雜誌社告上法庭。你們覺不覺得這樣做太跋扈了，太失去理智了？我們歡迎你們告上法庭。」<sup>⑥</sup>聽語氣，老頭動怒了，看來，辦《炎黃》是要動感情的。此事最後以原專案組方偃旗息鼓告終。

《炎黃》編有一份內部刊物，名《炎黃文存》，刊登一些不便公開發表的文章。據負責編務的趙友慈說，總共出了五六期，由我父親負責審稿、定稿。我在父親留下的工作筆記裏看到一段話：「把《炎黃文存》辦好，與《炎黃春秋》同等重要。」據趙友慈講，我父親為辦好《炎黃文存》「花了很多心血」。

我注意到，從創刊起父親就沒少做「責編」，方實的名字會出現在文章的末尾，他應該也用過化名。父親往往會親手編一些老朋友、老熟人如溫濟澤、凌雲、曾彥修、于光遠、李慎之等人的文字。姚錫佩先生在《炎黃》上發表過兩篇寫聶紺弩的長文，時間相隔十一年，都是方實編的<sup>⑦</sup>。

我從未聽父親提過聶紺弩或姚錫佩，但覺得他來做責編或許有緣故。辦雜誌當然要做編輯，但父親進入八十開外後，沒有中斷這項花費心力的工作。父親每周去雜誌社上三天班，其餘時間大多在家中看稿件，家人熟悉的一個場景，就是父親坐在書房裏一把藤椅上看稿子。

在父親留下的《炎黃》材料中，有一份2003年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劉志琴的來稿，題目是〈「老革命」的新覺醒——《炎黃春秋》評析〉，上面有父親的修改筆迹，有幾處值得一提：劉文說，「目前在民眾中擁有很高聲望，獨立運作而又碩果僅存的只有《炎黃春秋》一家」，父親將「只有」改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家」——不說過頭話是父親的風格；劉文三處說《炎黃》是「敢於說真話」的刊物，每一處都被改為：「說實話」，「說實話」，「說了實話」。在我看，「真話」和「實話」無甚區別，但父親對「實話」兩字似有偏愛。

材料裏有一張李銳寫的字條，請父親看看他幾年之前的一篇文章「還值不值得發表」；還有一份《炎黃》審稿意見紙，被審稿件題為「憶訪李銳」，父親寫下數行審閱意見，字迹工工整整，一絲不苟，時間為2005年2月下旬，距父親因中風突然倒下不足半年。

自2002年以來，父親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好，時常頭暈。後來聽醫生說，他的頸動脈早已嚴重堵塞。父親曾數度住院打點滴，情況一旦好轉就恢復工作。他曾跟家人商量是否減少工作量或不再去上班，但每次都只是說說而已。父親去世後，《炎黃》發布的訃告中有這樣一段話：「他不顧高齡和逐漸嚴重的病況，始終堅持在一線工作，為辦好雜誌付出了全部心

血。」<sup>⑥</sup>我認為，八十八歲的父親是倒在《炎黃春秋》崗位上的。

講一個尚未提及的家庭情況：我母親患老年癡呆，達十年左右，於1996年初去世。換句話說，1991年父親開始《炎黃》工作時，母親已經病得不輕。父親對母親始終呵護有加，有時會親自餵飯。在1990年代初期《炎黃》最艱難的創業階段，這就是父親回到家中的情形。

1992年是父親離開新華社工作崗位十周年，也是他參與《炎黃》工作一周年。他寫了一篇短文回顧過去十年的生活，裏面提到生病的老妻，提到子女和孫輩，也提到退下來後該做些甚麼：「〔要〕參加一定的專業工作和社會活動，目的不是為了追求勞務報酬，也不是為了追求名和利，而是為了把自己有限的一點知識和能力，無私地奉獻給社會和人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這個最後一點奉獻精神是很重要的。」<sup>⑦</sup>

父親的語言往往有些「套」，但他的話發自肺腑，其中「不追求名利」一句的背後是有根基的。八十四歲時父親再次在筆記本裏寫下：「『時時刻刻想到國家、時時刻刻想到人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淡泊名利、多做貢獻』——這就是我的座右銘。」

一位了解父親情況的新華社阿姨對我說，「你爸爸對《炎黃春秋》太投入了！」我想，一定是《炎黃》賦予父親晚年生命以「昇華性」意義，以至於他把自己的身體搭了進去。父親去世後，我看到他在雜誌社成立十周年時寫下的一行字：「鐵肩擔道義 妙手編文章」。父親從來不說這一類的豪言壯語，他很可能只是把這話寫在了自己的本子裏，就讓它作為這一節的標題吧。

## 八 從〈我在延安被「搶救」〉說起

編雜誌是為他人做嫁衣，父親自己寫得很少。2003年《炎黃》第十期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在延安被「搶救」——回憶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的文章<sup>③</sup>，這篇父親寫於他病倒之前兩年的長文，成為他最後公開說出來的話，也是他晚年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在這一節，我想以父親「被搶救」的經歷為案例，既談父親本人的情況，也談一談在父母親那代人中並非罕見的「道德創傷」(moral injury)現象。

文章中父親記述了1943年春他在延安交際處工作時，「莫名其妙地」遭到誘捕，最終「被搶救成特務」、在延安保安處監獄裏被關押二年十個月的「蒙冤含垢」經歷。在關於延安審幹的個人回憶文字中，父親的這一篇不但寫得較早，而且對保安處這一篇在「搶救運動」中關押「重犯」的「審洞監獄」做了詳實的描述。同時，父親對自己「充滿疑懼」的心理，對如何在別人「現身說法」的「規勸」下「坦白交代」的過程，也做了坦誠的說明。

父親之所以被關押，是因為有人誣告他是「特務」。用今天眼光去看，延安「搶救運動」實在匪夷所思：一時間「特務如麻」，「失足者」比比皆是，只要承認自己是特務、「坦白交代」誰是上級，就能得到「寬大」。今人看來似荒唐鬧劇，當年對經歷者卻有不可承受之重，而他們為此受到的終生難以痊癒的心理傷害，則是我近年來才逐漸意識到的。

我父親進了保安處後，因自知無辜，一直無法「坦白」，眼看着被關押的人愈來愈少，他的精神壓力愈來愈大。一天，負責「規勸」的人悄悄

對我父親說，他本人也不是特務，但編造些事交代了，就獲得了「自由」。於是父親絞盡腦汁，編造了自己的「特務故事」，把七哥葉篤正說成是「特務上級」，他想，反正哥哥在大後方，又不是共產黨員，不會給他帶來真正後果。如此這般交代之後，「果然寬大」了，父親最終離開了「禁錮身心近三年的保安處」。

我母親白天在丈夫突然「消失」後成了「特務老婆」，在延安行政學院接受審查。那裏雖然不算監牢，但也沒有行動自由。母親當時身體很差，亟需治療，她被告知只要承認是特務，就能出去治病，於是編造在大後方的哥哥是自己的「特務上級」，才得以出去。我的父母都「被搶救成特務」，我的七伯和三舅則分別成了「特務上級」，無獨有偶，不約而同，這不是黑色幽默，是父母生命經歷中無法抹去的一頁。

我第一次聽父親說他在延安坐過牢是在1980年代，當時深感驚訝，也想怎麼你過了這麼多年才說？父親的記憶力很好，當時的許多細節一定在他腦海裏反覆再現過，但是他到了六十多歲時才告訴子女，而當他終於落筆寫出來時，已經八十六歲了，如果從1943年他「被搶救」算起，整整過去了一個甲子。父親這樣解釋他為甚麼最終寫出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經歷：「去見馬克思之前，我還是想把這件奇聞記錄下來，目的是反思歷史，警示後人，類似這樣的怪事不能再重演了。」

吳思是那期《炎黃》的責編。他後來告訴我，看到稿子後，他希望我父親再做些補充：「因為後人很難理解這種事。」幾天之後，父親送回稿子，補充了一段話。吳思說，那段話讓他「震驚」。父親是這麼寫的：「雖

然被『寬大』了，待遇也比較『自由』了，但是當時我內心卻極為痛苦。過去我沒有說過假話，更沒有在政治性質的問題上造過謠。現在為了這點『自由』、『寬大』，竟然栽贓自己是『特務』，誣陷我的親兄弟是我的『特務上級』，這還算是人嗎！？還有沒有一點做人的道德和尊嚴？！<sup>④</sup>

「這還算是人嗎！？」——第一次讀到老父親這句話時，我有些無法自持。

這段話也讓當年不在延安的李普深受觸動：「讀着他這些話，我激動得幾乎要掉眼淚。方實是我的老朋友，朋友們都知道他是個忠厚老實的人，想不到他竟做了這樣一件事，而且這許多年來他經受了多麼揪心的痛苦。他現在把這件事和盤托出，這需要何等的勇氣，何等的胸懷！這種出自真誠的勇氣和反思使我十分感動，十分敬佩。」<sup>⑤</sup>

母親生前沒有跟我們講過她在延安「被搶救」的事，我是在她去世後看到文革後被退回的她的檢查交代材料才知道的。我永遠無法知道母親因「被搶救」而受到的傷害了。

1990年代後期，我曾對父輩中一些人做過訪談，其中有黃興的遺腹子黃乃。談到延安「搶救運動」時，他說在壓力下承認了自己是特務，並說當時以為承認了就會輕鬆，但之後卻感到十分糾結。說到此處，他把一隻手放在心口，臉上顯出因極疼痛才會有的扭曲表情。黃乃雙目失明，他胸前的枯手和臉上的表情我忘不了。

近年來，美國心理治療界有人用「道德創傷」這一概念來解釋從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場歸來的復員軍人身上出現的非物理性創傷，包括在情緒、精神、心理等層面的症狀<sup>⑥</sup>。應該說，「道德創傷」對古今中外的人類都不陌生，但頭一次聽到這個詞

卻讓我受到震動，它也幫助我拓開了一個認識和理解問題的視角，讓我去想我們中國人的事，去試圖觸摸我們自己的傷口。父親晚年說出深深自責的重話，黃乃臉上痛苦扭曲的表情，李莊心中的「淒愴」；還有，當年把父親「送進」保安處的上級領導金城（後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臨終前在病榻上向我父親道歉，而曾經的「文藝沙皇」周揚，文革後逢人必道歉，常常是口未開已淚水漣漣……凡此種種，不都可以理解為受過「道德創傷」的表現嗎？

無論是傷己還是傷人，事後都可能帶來道德的自我譴責。我們有太多傷害過別人、自己又被傷害的故事，它們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無法迴避。像曾彥修先生那樣，晚年能將自己的回憶錄題為《微覺此生未整人》的人，少而又少<sup>⑦</sup>。一個人能意識到和去正視自身的「道德創傷」，需要良知、自省力和勇氣，「療傷」的過程，也是道德重建的過程。

何方先生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這成為他心中除了1959年揭發批判張聞天之外背負的另一個大「包袱」。他晚年的兩部重要著作：《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和《從延安一路走來——何方自述》<sup>⑧</sup>，其緣起均與他那兩次經歷有直接關聯。「道德創傷」既可以給人的心靈帶來長久傷痛，也可以轉化為讓人追求真與善的巨大動力。

在傳統革命史敘事中，延安是泰山壓頂般的一方「聖地」，可以成為一些人炫耀的資本。一位新華社阿姨說，有些延安出來的人「動不動就『延安頌』」，還說，「你爸你媽從來不在我們面前吹噓，沒有延安架子」。「延安」是一個複雜多面的話題，「延安

學」已成為中國現代史學中的一支。對許多「從延安一路走來」的人來說，延安的經歷，特別是「搶救運動」，影響和籠罩了他們大半輩子。如何認識它，說明它，是父輩們晚年要面對的問題。

一位《炎黃》工作人員告訴我，溫濟澤和方實「想把延安問題搞清楚」。我們今天看到的，是1992年溫濟澤為王實味案所寫的文章；《炎黃》於1994年登出第一篇關於延安「搶救運動」的文章，責編是方實<sup>⑨</sup>；到了2003年，父親終於寫下他本人「被搶救」的經歷。

為甚麼父親用了這麼長的時間？從動念到下筆，他經歷了怎樣的思想歷程？我已無從知曉。也許，他首先要戰勝的，是自己心中根深蒂固的「怕」，它已經跟了他那麼多年。我深知，心中有「怕」的父母輩，不在少數。杜導正在《炎黃》成立十周年紀念會上說，辦雜誌，他們得面對「敢不敢、要不要講真話的問題」，可見對以「膽大」著稱的杜導正而言，也有一個「敢不敢」的問題。關於父母輩的「怕」（即恐懼），值得認真作一篇長文，它可以成為另一篇文章的主題。

文革是我經歷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也是在那時，我發現父親很膽小，也發現父母輩「老革命」中其他一些人也很膽小，他們的「怕」傳染給了我。父親曾經背着我檢查我的日記，還撕去了一些頁，後來對我說，如果別人讀了去告發，我會被抓進監獄的，其實日記裏無非寫了一個少年對那場瘋狂運動的困惑不解。由於父親的「怕」給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六四風波」後他在電話中的直言才令我既感動又驚訝。我多麼想知道父親是如何從「怕」變得「不怕」的。

在2006年夏對杜導正的訪談中，我談到了記憶中父親的「怕」，也問了心中的問題。老杜叔叔沒有跟我討論「怕」，而是向我解釋：「你爸爸和我一樣，就是馴服工具，後來反思了，他〔指我父親〕不是一個人，是一批人……現在回頭看，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血和淚的教訓，驚醒了中國共產黨裏大批的仁人志士，這批人覺悟了，……你爸爸是自己的自覺，自己的反思，和周圍朋友們的影響，互相影響。」杜導正還說，知識份子（應理解為加入中共的知識份子）分成三類：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我和你爸爸屬於第二類，後知後覺。我們開始也劃右派，也整人，你爸爸、老杜我也整人，整人也很兇的，劃右派啊。

1997年晚秋某日，我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在一個場合，看到父親對在座的當年新華社國內部被打成右派的人鞠躬道歉，語帶哽咽，提到自己經歷過延安「搶救運動」，說應該知道挨整的滋味啊……

父親病倒及去世以後，我曾對新華社多人進行訪談，其中一個話題是1957年反右運動和我父親的表現。在國內部被打成右派的李耐因給我講了很多情況，並把當時新華社總社和分社各級領導的表現分為三類：不同意（反右）的，極少；不是特別同意、壓力下跟着走的，多數；熱衷整人的，也是少數。李耐因認為我父親屬於第二類。他還告訴我：文革後，新華社為反右運動公開出來道歉的只有兩個人，「總社是你爸，分社是杜導正」。這兩人恰恰都是《炎黃春秋》的。

前面提到2006年春我陪七伯葉篤正造訪李銳，那天一進門，李銳就指着我伯伯的腳說，「你是天足，我們都是纏過足的」。我明白李銳在說甚麼。

「纏過足的」要放足，「怕」要變成「不怕」，曾經的「馴服工具」要成為具有自己理念和意志的人，「崇尚真實、崇尚獨立」，勇於直面本人歷史上的污點，勇於批判性反思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這就是方實和杜導正他們那「一批人」晚年所做之事。作為後輩，我知道他們的「跋涉」有多麼不易。雖然是「後知後覺」，老人們的「後勁」卻不小，一旦啟動，哪怕舉步維艱，哪怕阻力重重，哪怕老病之身，只管一路往前走，義無反顧。

## 九 最後想說的一些話

很多年前父親還為《炎黃》操勞時，我就對「《炎黃春秋》現象」產生興趣。放眼世界，我不知道哪裏還有這樣一批老年人，不是消消停停頤養天年，而是聚在一起出雜誌，翻「舊賬」，發議論，成為1990年代以來一場包括中國各界人士在內的自發、自主、自覺的「思想工程」之中堅，給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炎黃春秋》現象」古今中外難尋，它是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獨特的中國故事。

感動讚歎之餘，我也不無感慨，意猶未盡，在結束這篇長文時，我想說出下面的一些話：

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出現了《新青年》雜誌；二十世紀末期，出現了一批「新老年」和《炎黃春秋》雜誌。對百年中國而言，這一頭一尾、一「新」一「老」的反差，是可喜還是可歎復可悲？

又，雖然此文重點在記述中共黨內一批老人，但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炎黃》不屬於一個人，不屬於幾個人，也不屬於「一批人」，它的生存和發展仰仗中國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鼎

力支持和悉心養護，它是社會的公器，是民意的體現。

此公器具「中國特色」，該特色構成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炎黃》的存在拓寬了中國社會言論的空間，呈現出「公民社會」的雛形；另一方面，《炎黃》能夠一次次有驚無險地活下來（直到2016年夏），又與「一個人，幾個人，一批人」的「官家」身份分不開，與中國社會對權力和等級地位的尊崇分不開，其背後反映的，是話語權根本性的不平等，是人際關係根本性的不平等；雖說《炎黃》是一家「體制外」刊物，但它並沒有真正擺脫「體制」的邏輯和束縛。

我注意到，1995年初雜誌社在北海旁邊的文采閣開會時，發言人的順序不是按身份地位安排的，王景山在李銳之前。隨着《炎黃》逐漸站穩腳跟，愈來愈多的前中共高官聚攏在它周圍，到了雜誌社創刊十五周年慶典時，出席者冠蓋如雲，發言也按身份地位排名次了。我不得不想：《炎黃》身上的「官家氣」是不是愈來愈重了？到了2006年，王景山的名字已經不在特邀編委名單裏，雖然他仍然健在。

還有一個問題，在上篇關於「司令員與政委」那一節已做過鋪墊，這裏明確提出來，即《炎黃》內部運作在多大程度上是靠「人治」，又在多大程度上靠一個設計合理、權力受到監督、不受人事變化影響的「制度」？當然，在中國的環境下，一家雜誌，即便是《炎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自己做主？更何況多年來雜誌的生存不斷面臨威脅，應對不暇。這裏說的是外部情況，咱們也看看內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裏（至少在我父親任事的十四年間），這個雜誌的核心是一批理念相仿的老共產黨人，他們既可做《炎黃》對外的保護傘，也無形中

對《炎黃》內部關係形成平衡與制約。但是老人們來自體制內，他們不但缺乏「制度」建設的經驗，也缺乏對此目標的切實追求和探索。在雜誌社創刊十五周年紀念會上，社長杜導正希望《炎黃》成為「中國報刊史上體制探索的一個版本」<sup>⑩</sup>。令人遺憾的是，這始終是一個願景。

「官家氣」、制度建設方面的缺失，反映出中國社會的普遍問題，根源複雜深重，我們不能苛求一家雜誌，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炎黃春秋》的局限性。隨着老人們生理生命的衰微，《炎黃》恐怕也會難以為繼。

《炎黃》後來被終結的方式，是已故的老人們絕不會接受的，我甚至想，幸虧他們已經遠去！但同時我也不得不問：作為「政治特區」，《炎黃》有可持續性嗎？這個問題可以從「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提出。問題既出，我心中的感受，一言難盡，五味雜陳。

《炎黃》以對中國近現代史「求實存真」令世人稱道。但寫歷史，不僅要講出「真相」，更要在此基礎上做出闡釋說明。多少年後，當「真實是歷史的生命」成為平凡的真理，而非「仁人志士」的壯舉，當人們無需抬出「董狐筆」，或借某屆中共中央會議精神做保護傘，也不必靠「大佬」和「高官」身份撐腰，那時的人們也許會覺得，《炎黃春秋》無非是說了一些實話，沒有甚麼大不了，他們能夠理解當年《炎黃》諸公說出「真相」時內心的掙扎和外部的艱辛阻礙嗎？

也因此，我要把話再說回來：

「老派共產黨員」溫濟澤先生在世前對自己如此定位：「我是一個好黨員。」2016年初父親去世時，他已有七十七年黨齡，我寫下這樣一段話：「他是一位具有反思精神的共產

黨員，那樣的一代共產黨人中的絕大多數已然離我們而去，成為歷史的絕響。他們應當被中國人記住。」

寫這篇文章時我心中的糾結，是如何定位父輩。多少年後的中國人可能不會明白溫濟澤和方實那樣一代中共黨人了，我想，我對他們有些明白。

在這裏，我以一個女兒和歷史工作者的雙重身份，向《炎黃春秋》雜誌和一代具有反思精神的中國老人，致以深深的敬意。（本期續完）

### 註釋

① 「走向未來」叢書是金觀濤和劉青峰主編、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套叢書，介紹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等領域的外文譯作和中文原創著作，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中影響很大。

② 從2006年以來十餘年間我陸續對多人進行採訪，包括十一位《炎黃春秋》工作人員、十六位新華社工作人員，以及《中華英烈》工作人員秦曉鷹和《炎黃春秋》作者尹騏，其中杜導正先生於2006年8月23日和2009年8月17日兩次接受採訪。文章中引文如無特別註明，均出自訪談。

③ 本刊編輯部：〈我們二十五歲了〉，《炎黃春秋》，2016年第7期，頁2。

④ 參見葉維麗：〈方實與《炎黃春秋》——世紀之交的中國故事(上)〉，《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9年6月號，特別是第三節「到了不好開口像是笑話的程度」。

⑤ 本刊編輯部：〈今年我們怎麼辦雜誌〉，《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頁1。

⑥ 參見《炎黃春秋創刊二十周年1991-2011》紀念冊（《炎黃春秋》雜誌社自印）。

⑦ 蕭克：〈《長征大事典》序言〉，《炎黃春秋》，1996年第12期，頁6；〈序言〉，載《長征大事典》編委會編：《長征大事典》，上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頁1-3。

- ⑧ 王景山：〈我喜歡《炎黃春秋》〉，《炎黃春秋》，1994年第8期，頁41。
- ⑨ 本刊編輯部：〈尊重史實是本刊辦刊的原則〉，《炎黃春秋》，1995年第1期，頁4。
- ⑩⑪ 王景山：〈送別老宋〉，《炎黃春秋》，2004年第8期，頁36-38；36。
- ⑫ 王景山：〈西南聯大和《茶館小調》〉，《炎黃春秋》，2003年第10期，頁71-73。
- ⑬ 李喬：〈《炎黃春秋》印象〉，《炎黃春秋》，2006年第9期，頁79。
- ⑭ 本刊編輯部：〈《炎黃春秋》隆重紀念創刊五周年〉，《炎黃春秋》，1996年第8期，頁79。
- ⑮ 參見本社全體同仁：〈本刊致讀者鄧太玉同志的慰問信〉，《炎黃春秋》，1999年第1期，頁80。
- ⑯ 肖徐：〈這個雜誌講實話〉，《炎黃春秋》，2002年第4期，頁80。
- ⑰ 牛兆奇：〈多登些反映事實真相的「親歷」的文章〉，《炎黃春秋》，1997年第5期，頁79。
- ⑱ 〈編讀往來〉，《炎黃春秋》，1994年第3期，頁1。
- ⑲ 〈南京石璜：續訂本刊後的囑託〉，《炎黃春秋》，1995年第1期，頁83。
- ⑳ 參見「讀者來信」，《炎黃春秋》，1992年第8期，頁94。
- ㉑ 燕凌：〈祝《炎黃春秋》十五周年〉，《炎黃春秋》，2006年第8期，頁80。
- ㉒ 李普：〈說說《炎黃春秋》〉，《炎黃春秋》，1997年第1期，頁80。
- ㉓ 陳鐵健：〈寫歷史應去偽飾求真實〉，《炎黃春秋》，2003年第2期，頁73。
- ㉔ 2002年2月27日我參加了「《炎黃春秋》新春座談會」，此段話來自我現場所做筆記。又見杜潤生：〈把《炎黃春秋》辦成《資治通鑒》現代版〉，《炎黃春秋》，2002年第4期，頁78。
- ㉕ 〈讀者的希冀〉，《炎黃春秋》，1995年第4期，頁88。
- ㉖ 于光遠：〈建議《炎黃春秋》開一個故紙堆的欄目〉，《炎黃春秋》，2000年第2期，頁79-80。
- ㉗ 歐遠方(1922-2001)，安徽省人，193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前曾擔任《安徽日報》總編輯、

- 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長；1983年起任安徽省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曾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多篇文章，包括〈五四運動與社會主義民主〉(1999年第2期，頁60-65)、〈政治體制不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就難前進〉(2000年第3期，頁33-37)、〈談獨立思考〉(2001年第2期，頁61-62)。歐遠方去世後，于光遠和杜導正分別發表紀念文章，參見于光遠：〈中國有個歐遠方〉、杜導正：〈獨立思考在晚年——歐遠方逝世周年祭〉，《炎黃春秋》，2002年第4期，頁34-35、36-38。
- ㉘ 本刊編輯部：〈新年寄語〉，《炎黃春秋》，2003年第1期，頁80。
- ㉙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炎黃春秋》，1995年第11期，頁4-14；李昌平：〈農村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兩筆賬〉，《炎黃春秋》，2004年第4期，頁10-12。
- ㉚ 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頁9-11；楊金聲：〈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炎黃春秋》，2002年第7期，頁40-41。
- ㉛ 溫濟澤：〈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炎黃春秋》，1992年第1期，頁22-28。
- ㉜ 在由溫濟澤等著的《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一書「附錄」中，不但收集了王實味的兩篇文章(其中之一是〈野百合花〉)，也有溫濟澤的〈鬥爭日記——中央研究院座談會日記〉。參見溫濟澤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頁185-98。
- ㉝ 李慎之：〈回應李普《悼胡繩》的信〉，《炎黃春秋》，2001年第6期，頁32。
- ㉞ 李慎之：〈一個有七十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載方實、楊兆麟主編：《永遠的懷念：溫濟澤紀念文集》(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2)，頁59。
- ㉟ 方實：〈「我是一個好黨員」——溫濟澤臨終給自己的定位〉，載《永遠的懷念》，頁50；50-51。
- ㊱ 溫濟澤：〈告別20世紀〉，《炎黃春秋》，1999年第1期，頁29；33；30。
- ㊲ 曾彥修：〈一個大寫的人〉，載《永遠的懷念》，頁41。

- ④① 溫濟澤：〈致《炎黃春秋》編者〉，1992年第6期，頁96。
- ④② 曾彥修：〈一個大寫的人〉，頁38；〈溫濟澤與溫良恭儉讓〉，《炎黃春秋》，2003年第5期，頁24-25。
- ④③ 李莊：〈難得清醒——一個老編輯對若干政治運動的反思〉，《炎黃春秋》，1994年第6期，頁42；並見李莊：《難得清醒》（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一書中有關章節。
- ④④⑤ 李莊：〈難得清醒〉，頁43；34-43。
- ④⑥ 廖蓋隆整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黃春秋》，1993年第1期，頁12-19。
- ④⑦ 李銳：〈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頁1-4。
- ④⑧ 本刊編輯部：〈志存高遠站在時代前列〉，《炎黃春秋》，2000年第1期，頁1。
- ④⑨ 于光遠：〈崇尚真實 崇尚獨立〉，《炎黃春秋》，2000年第1期，頁3。
- ④⑩ 曾彥修：〈有哪些文章可做？〉，《炎黃春秋》，2000年第1期，頁9。
- ④⑪ 張豈之：〈對《炎黃春秋》四點建議〉，《炎黃春秋》，2001年第1期，頁5。
- ④⑫ 葉篤莊：〈一代遺傳學宗師李景均何故去國——記50年代初強制推行「米丘林學說」在中國引起的風波之一〉，《炎黃春秋》，1997年第7期，頁35-41；〈令人讚歎的生物學家「陸大傻子」〉，《炎黃春秋》，2000年第1期，頁26-30。
- ④⑬ 《達爾文進化論全集》由葉篤莊主譯，於1998年由北京科學出版社全部出齊。
- ④⑭ 申泮文：〈培育出新中國兩位總理的名校——紀念天津南開中學建校一百周年〉，《炎黃春秋》，2004年第10期，頁23-64。
- ④⑮⑯ 趙淮青：〈「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炎黃春秋》，2000年第2期，頁12、15；12。
- ④⑰ 趙淮青：〈華崗的卓越貢獻與悲慘遭遇〉，《炎黃春秋》，2002年第7期，頁42-48；〈鐵骨金聲 巍巍其人——呂燮先生逝世35周年祭〉，《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頁65-69。

- ④⑱ 李慎之：〈懷念報人李炳泉〉，《炎黃春秋》，2003年第8期，頁52-55。
- ④⑲ 方實：〈悼炳泉〉，載劉可興主編：《李炳泉紀念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8），頁85-89。
- ④⑳ 姚錫佩：〈雜文大家聶紺弩的坎坷路〉，《炎黃春秋》，1992年第3期，頁47-53；〈聶紺弩識知馮雪峰〉，《炎黃春秋》，2003年第6期，頁61-67。
- ㉑ 〈《炎黃春秋》前副社長方實去世〉，《炎黃春秋》，2016年第2期，頁29。
- ㉒ 該文發表在新華社內部報紙《前進報》上。我看到的是父親手寫草稿。
- ㉓④⑳ 方實：〈我在延安被「搶救」——回憶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炎黃春秋》，2003年第10期，頁14-19；18。
- ㉔ 李普：〈李炳泉之死〉，載《李炳泉紀念文集》，頁5-6。在這篇悼念李炳泉的文章中，李普用了一頁紙寫他讀了我父親文章後的感想。
- ㉕ 由於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與原來的道德理念發生嚴重衝突，一些從伊拉克、阿富汗戰場歸來的美國復員兵內心受到自我譴責，無法融入和平的日常生活。相比戰爭給人帶來的非物理性傷害，「道德創傷」這一概念多了「道德」的維度，關注經歷者本人「自責」的主觀感受。
- ㉖ 曾彥修：《微覺此生未整人：曾彥修訪談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
- ㉗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從延安一路走來——何方自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
- ㉘ 田方：〈海燕事件——延安「搶救運動」中的一個小插曲〉，《炎黃春秋》，1994年第12期，頁59-60。
- ㉙ 杜導正：〈沿着這條辦刊道路走下去——紀念《炎黃春秋》創刊十五周年茶話會上的匯報發言〉，《炎黃春秋》，2006年第8期，頁76。

葉維麗 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  
波士頓分校歷史系教授（已退休）。